

· 民族文献与民族学研究 ·

《西夏书》考略

胡玉冰

有清一代，乾嘉考据学风大盛，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对古史的搜辑钩沉工作。在中国西北边陲立国近两个世纪的封建割据政权——西夏国的历史，引起了不少清代史家的关注，他们从各种文献中搜寻史料，纷纷著书立说，试图重现神秘的西夏国的历史，这样，在清代诞生了一批汉文西夏史籍。由于种种原因，这批汉文西夏史籍中的绝大多数已亡佚，留存于世的对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弥足珍贵。在传世的清人著汉文西夏史籍中，《西夏书》是颇有特点的一部。清人著汉文西夏书中有几部都用《西夏书》命名，这里要考证的是著录为周春撰写的《西夏书》。

《西夏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纪传体来记述西夏历史的汉文西夏史籍，也是传世的汉文西夏史籍中惟一一部纪传体断代西夏史书。经过辨证，笔者认为，学者对传世的《西夏书》的编著者、卷数、内容等诸多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发表个人管见，力图还《西夏书》以原貌，廓清对《西夏书》认识上的误区。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赐教。

一、对《西夏书》作者和卷数的著录

所谓著录，指的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方法把一部文献的作者、

卷数、内容及版本等情况记录下来。《清史稿》卷146《艺文志·史部·载记类》著录：“《西夏书》十卷，周春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61《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录：“《西夏书》十五卷，周春撰。”《光绪杭州艺文志》著录：“《西夏书》十五卷，海宁周春撰。”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卷二《史部·载记类》著录：“周春《西夏书》十五卷，未刊。”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西夏史料·清》著录了两部编著者、卷数均异的《西夏书》，一部是藏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抄本《西夏书》，十卷，周春撰，另一部《西夏书》为十五卷，题名周莲撰。

从上述著录看，《西夏书》卷数、编著者均有两说，卷数有十卷说、十五卷说，编著者有周春说、周莲说。自清迄今，绝大多数学者在谈及传世的《西夏书》时，几乎都倾向于《清史稿》的说法，认为《西夏书》卷数是十卷，编著者是周春。据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题名为《西夏书》的残抄本。北大藏书即邓衍林著录的十卷本《西夏书》，抄本后有胡玉缙写的《西夏书书后》，曰：“《西夏书》十卷，海宁周春撰。”上海师大藏抄本题书名为《西夏书列传》，未署编著者名。经笔者核查，除极个别文字和抄写字体（北大藏本为隶书，上师大藏本为楷书）有不同外，这两部抄本的内容、编撰体例、抄写格式均完全相同，可以断定，这是同一部著作的两种不同的抄本。通过分析比较这两种抄本，结合其他文献佐证，笔者认为，传世的《西夏书》是残本，卷数存十一卷，《西夏书》的卷数完整的应该是十五卷，编著者不只是周春一个人。

二、《西夏书》内容及其卷次排序缀合

北大、上师大所藏《西夏书》抄本内容现存三大部分，即《列传》、《载记》和《考》。

《列传》共四卷，卷端标题分别为《西夏书列传》卷之一、

《西夏书列传》卷之二、《西夏书列传》卷之三、《西夏书列传》卷之四。卷一次行题为《妃嫔传》，记太祖母卫慕氏至仁宗后罔氏等八位夏主后妃的生平事迹，对桓宗、襄宗、神宗、献宗和末帝昀等夏主的后妃未述及。卷二次行题为《家人传》，主要记与西夏皇族有直接血亲关系者的事迹，包括被废的太子德任、李惟忠、李楨等人。卷三次行题为《臣传》，记西夏开国诸臣、叛臣等，其中包括张浦、野利旺荣、张元、吴昊、任得敬等西夏国的重要大臣。卷四次行题为《外国记》，记吐蕃、党项、羌、回鹘、于阗、大食国等国之事。

《西夏书·载记》有残缺，内容全存者有三卷，卷端标题分别为《西夏书》卷之五、《西夏书》卷之六、《西夏书》卷之七。卷五次行题为《载记三》，记西夏第三代国主惠宗秉常事。卷六次行题为《载记四》，记西夏第四代国主崇宗乾顺事。卷七次行题为《载记五》，记西夏第五代国主仁宗仁孝、第六代国主桓宗纯佑、第七代国主襄宗安全、第八代国主神宗遵顼、第九代国主献宗德旺和第十代国主昀的事迹。西夏开国之主景宗元昊和第二代国主毅宗谅祚事迹有残缺。景宗元昊的《载记》缺首页的前半页，完整的应为十八页。根据《载记》卷端题名和次行标题的体例，残缺了的首页前半页卷端标题应该为《西夏书》卷之三，次行标题为《载记一》。毅宗谅祚的《载记》仅存首页的前半页，具体亡佚页数不详，卷端标题为《西夏书》卷之四，次行标题为《载记》，根据《载记》次行标题体例，此《载记》应补作《载记二》。

《西夏书·考》存两卷。《地理考》卷端标题为《西夏书》卷之九，次行标题为《地理考》，比较详细地考证了西夏国河南九州、河西九州、熙秦河外四州共二十二州的建置兴废以及西夏逐步占领这些州的历史沿革，同时考证了西夏国的部分军城堡寨和几条河渠的基本情况。《官氏考》卷端标题为《西夏书》卷之十，次行标题为《官氏考》，以考证西夏职官、姓氏为主，列举了西夏职官

五十三种、姓氏六十七种。

现在我们将《西夏书》卷端标题和次行标题按传世《西夏书》的原书排列顺序排出：《西夏书列传》卷之一《妃嫔传》，《西夏书列传》卷之二《家人传》，《西夏书列传》卷之三《臣传》，《西夏书列传》卷之四《外国传》，《西夏书》卷之三《载记一》（缺首页前半页），《西夏书》卷之四《载记二》（存首页前半页），《西夏书》卷之五《载记三》，《西夏书》卷之六《载记四》，《西夏书》卷之七《载记五》，《西夏书》卷之九《地理考》，《西夏书》卷之十《官氏考》。通过排序，我们发现了这样三个问题：首先，《西夏书》卷之八内容全佚。其次，抄本卷端标题体例不一：《列传》部分全题为《西夏书列传》，包括书名、体裁名；《载记》、《考》部分则只题书名《西夏书》，体裁名在卷端次行标出。第三，组成《西夏书》的三部分内容卷次顺序号衔接不上。按体例，《西夏书列传》卷之四《外国传》之后应接序卷之五、卷之六……，传本《西夏书列传》卷之四后却接《西夏书》卷之三《载记一》。上述三个问题中，后两个问题尤其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传世的《西夏书》是未完之作，是由两部未完的西夏史稿拼凑而成，形式上看是一个整体，其实两者并未真正融为一体。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在由一人独撰的已成定书的史书中，卷端标题体例不一的现象非常罕见，传世的《西夏书》卷端题名或者统一为只题书名加卷次，如“《西夏书》卷之一”，或者统一为书名加各部分体裁名再加卷次，如“《西夏书列传》卷之一”、“《西夏书载记》卷之五”，但传世《西夏书》并未作这种统一卷端题名体例的工作。

第二，按照我们对卷端题名中卷次的排序，《列传》与《载记》部分卷次有交叉现象。按原书体例排序，《西夏书》卷之三《载记一》之上还应该有《西夏书》卷之一《××》、《西夏书》卷

之二《××》，再加上内容全佚的《西夏书》卷之八《××》，这样，卷端题名为《西夏书》的内容至少是十卷。如前所述，《列传》与《载记》、《考》两部分内容的卷数序号是分离的，也就是说，传世的《西夏书》卷次序号不是一贯到底的，这样，卷端题为《西夏书》的十卷，加上卷端题为《西夏书列传》的四卷，完整的《西夏书》内容最少是十四卷。

第三，我们从三篇序文中找到了很有价值的佐证，证明《西夏书》编著者可能不只周春一人，完整的《西夏书》卷数并非十卷。第一篇序文是清人吴騫的《西夏书序》，序曰：“松霭先生尝著《西夏列传》，以史氏之阙，顷复续成《世纪》二卷，《载记》五卷，《年谱》一卷，《考》三卷，合前（原误作“萌”）《列传》四卷，哀然为定书云。”吴騫认为，《西夏书》定本应该是十五卷，包括《世纪》、《列传》、《载记》、《年谱》、《考》共五部分内容。吴騫还认为《西夏书》除《列传》是由周春编写之外，其余部分是周春之兄周莲续作。吴騫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浙江海宁人，他和周莲、周春是同时同地人，此说可信度很大。《西夏书》在《清朝续文献通考》、《光绪杭州艺文志》、《书目答问补正》、《中国边疆图籍录》中也均著录为十五卷，这进一步证明了吴騫之说。第二篇序文是附在传世的《西夏书》之前的《西夏书列传自序》，这篇序是编著者对《西夏书列传》编著过程的介绍，序后落款未署名。傅增湘先生在其《藏园群书题记》卷二《史部·纪传类·西夏书稿跋》后附录了自己经眼的《西夏书列传自序》，^①落款是“太岁月日同在，周春识”。从自序看，周春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西夏史书，鉴于“夏书唯传最难写”，所以他花了五十天的时间先完成了四卷西夏书《列传》的编写工作，这也只是《列传》的未定稿。令人费解的是，周春再未述及《西夏书》其余部分的编写情况。假如周春已完成了整部《西夏书》的编写，他在写自序时强调《列传》的编写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

不言《世纪》、《载记》、《年谱》、《考》等几部分内容的编写情况则与情理不符。较为合理的推测是，周春只完成了《西夏书》个别部分编写计划，并未完成全部计划。吴騫所列举的《西夏书》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有些并非周春所写。那么周春到底完成了哪些部分的编写呢？让我们看一下第三篇序，王秉恩在《西夏纪序》中说：“周松霭《西夏纪传》十卷，余访得传抄稿本，亦未完书。”王秉恩说得很清楚，他曾访到周春书的稿本，是一部未完之作。从他所得书的书名看，周春的十卷《西夏书》中除传外，还有“纪”。传世的《西夏书》中，《载记》部分未述及景宗元昊立国前各代夏主的事迹，像思恭、继迁、德明等人在西夏历史中都是值得大书的人物，不述及他们的事迹，编写出来的西夏史就不可能算得上是完整的西夏史，这显然不符合周春创作《西夏书》的初衷。传世的《西夏书列传》卷二《家人传·思孝传》前有这样一句话：“思恭事具《世纪》。”这表明，元昊以前各代西夏国主的事迹在《世纪》中都有交待，周春用这种方式省去了许多笔墨，使他叙事不再重复。按史书通行的编纂叙事原则，《世纪》部分应该是《西夏书》最前面的部分，这也和吴騫的记叙相吻合。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认为，传世的《西夏书》是一部未完之作，按编纂计划，该书总卷数是十五卷。传世《西夏书》内容首尾完整者九卷，内容残缺者二卷，内容全缺者四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已无法确考。从《西夏书》传世情况看，由于它全靠手抄传世，从未刊行过，在辗转传抄中，有些内容可能就失抄不传了。从《西夏书》编写情况看，《列传》肯定是周春一人完成的，《世纪》可能周春也已完成，只是没有传下来而已，但也有可能是由另外的人编写，或者《世纪》的编写仅是计划，最终并未完成。其他《载记》、《考》及《年谱》等部分的作者是不是周春，就很值得怀疑了，并且《年谱》是否完成过也值得怀疑。按照史书各部分内容的排序惯例，笔者推测，完整的《西夏书》应包括：《世

纪》二卷、《列传》四卷、《载记》五卷、《考》三卷、《年谱》一卷。

三、周春其人其事

周春，字松霭，晚号黍谷居士，别号内乐村农。一作字芑兮，号松霭。浙江海宁人，生于雍正七年（1729），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享年87岁。《清史稿》卷481《儒林传》、卷484《文苑传》及《清史列传》卷68《儒林传》有传。乾隆十九年甲戌科（1754）进士，二甲第31名，与清朝著名的史学家王鸣盛、纪昀、钱大昕等人是同科进士。官至广西岑溪县知县，有古循吏风，后因父丧离任，居家守丧。岑溪百姓自发修建了岑溪三贤祠，在祠中生祭周春和该县前任县令刘信嘉、于烜，以褒奖他们三人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恩泽，这足以表明周春治政的政绩。周春服闋即守丧期满后再也无意仕进，遂居家专心治学，直至终年。

周春家富藏书，书斋名“著书斋”，斋中图书插架环列，终年不扫尘土，致使凝灰满室。周春坐卧其中三十余年，经史子集靡不浏览。藏书家一般以拥有宋版书自夸。周春曾得到南宋汤汉的《陶靖节诗注》宋刻真本和《礼书》宋刻真本，他遂以为宝，秘不示人，并改书斋名为“礼陶斋”。周春本打算用这两部珍籍给自己陪葬，但由于经济拮据，只好先卖掉了宋版《礼书》，遂改书斋名“宝陶室”，最后宋版陶注也被迫忍痛割爱，遂改书斋名为“梦陶斋”，他对宋版书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周春家藏图书一般都钤有自己的藏书印，印文有“周春松霭”、“海宁周氏家藏”、“著书斋”、“松声山房”、“子孙继昌”、“自谓是羲皇上人”、“内乐村农”等。

周春博学好古，著述颇丰，尤精音韵学。他的学术著作除《西夏书》外主要有：《十三经音略》十三卷，《古文孝经》一卷，《孝经外传》一卷，《尔雅补注》四卷，《小学余论》二卷，《代北

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辽诗话》一卷，《选材录》一卷，《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海昌胜览》二十卷，《红楼梦随笔》，《松鹤遗书》等十多种，学术领域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十三经音略》“专考经音，以陆氏《释文》为权舆，参以《玉篇》、《广韵》、《五经文字》诸书者，字必审音，音必归母，谨严细密，丝毫不假。”^②该书内容“精博无伦，为当时治经者所推崇，亦可传之作也。”^③《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则对杜甫诗中善用双声叠韵构成对仗，作为修辞手段以增强艺术效果的特点揭示得很深刻，见解独到。

与《西夏书》相关的人中，周莲最值得关注。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中著录的十五卷本的《西夏书》编写者即为周莲。周莲是周春的哥哥，字予同，号玉井，生卒年不详。乾隆十八年癸酉科（1753）举人，家富藏书，偕其弟春自为师友，皆以博学闻名。有《玉井山樵诗钞》传世。周莲是否参与《西夏书》的编写，由于史料缺乏，尚难断言。从传世《西夏书》和文献材料佐证，《西夏书》实非成于一手，若有他人参与，周莲的可能性应当最大。邓氏书中提及周莲撰《西夏书》，不知何据，留待以后查证。

四、《西夏书》的史学特点

由于历史和编写者自身的局限，《西夏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各部分内容未能融为一体，割裂痕迹明显；编写者未能更广泛地搜集材料，对选用的材料也未能全都加以辨明；《载记》部分许多纪年下没有史事，空白很多；“论曰”部分有的与史实不符，有妄下雌黄之弊。再加上在传抄过程中有脱、讹、衍、倒等现象，所以我们在利用《西夏书》时一定要批判继承。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西夏书》的史学价值。

传世的《西夏书》虽为残本，但它对于我们了解西夏历史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传世的汉文西夏史籍中，《西夏书》颇

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西夏书》是传世的清人著汉文西夏史籍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它对其他学者编写西夏史书影响很大。

第二，《西夏书》是汉文西夏史籍中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纪传体断代西夏史书。编书者大胆采用纪传体写西夏历史，敢于冲破封建正统史学观念的束缚，这种精神是很可宝贵的。在中国历史上，西夏尽管立国近两个世纪，但中国封建王朝自宋迄清始终认为西夏国是割据政权，不承认它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封建王朝，所以封建史家在编史时一直遵循尊宋贬夏的惯例，绝不给西夏史以“正史”的地位。表现在史体选择上，不用纪传体这种封建史家推崇的史体编西夏史，而是选用编年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等体裁编西夏史。在安排西夏历史在其他王朝史书中的位置时，或列入《外国传》，或列入《载记》中，绝不会平等对待西夏历史和其他王朝历史。《西夏书》的编者虽然未能从根本上冲出这种束缚，依然把西夏立国后自景宗元昊至末主昫等十位夏主的事迹列入《载记》中，但他们敢于大胆采用纪传体写西夏史，以西夏国帝王将相为中心来记叙西夏历史，在《载记》中均以夏主年号纪年，这些作法，在清代治西夏史诸家中可谓独树一帜。传世的汉文西夏史书，凡编年纪年均以宋、辽、金年号为正统，西夏年号为附庸，《西夏书》以西夏年号纪年，最为真实地反映了西夏历史，是名副其实的西夏史书。

第三，《西夏书·地理考》和《官氏考》为研究西夏地理、职官、姓氏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材料，为后人编写此类资料提供了借鉴。《地理考》记录了西夏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所辖城镇堡寨、山川河流、地望方位内容，是研究西夏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史料。《官氏考》专门研究西夏职官和姓氏制度，官职部分列举的一些官名其他史书未载，如“观文殿大学士”，这就丰富了西夏职官制度的研究资料，使人们对西夏官制的了解更加完备。《姓氏考》共列

举了西夏姓氏六十七种，其中一字姓十一种，二字姓四十五种，三字姓一种，四字姓一种，党项姓八种，元代西夏姓氏一种。这些都为清代张澍编《西夏姓氏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四，《西夏书》采用“论曰”的形式发表编写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考证史实，或臧否人物，或纵论史事，均能直抒胸臆，观点鲜明。“论曰”内容丰富，涉及西夏政治、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外交等各个领域，一方面反映史书编写者学识渊博，亦可以补史传所未备。

注：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

②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1《周春传》，中华书局，1976年7月。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9《经籍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

作者工作单位：宁夏大学中文系

（上接第211页）

⑩参日本·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日本：福武书店，1978年，页344。

⑪为方便叙述，笔者将P2810分为P2810（甲）与P2810（乙），将S2506分为S2506（甲）与S2506（乙）两部分，各部分所指具体内容见行文。

⑫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第8期（总303期），1981年，页12。

⑬参王利器：《〈文子疏义〉序》，《晓传书斋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74。

⑭引文中“玄”原避康熙讳，皆作“元”，今改回。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